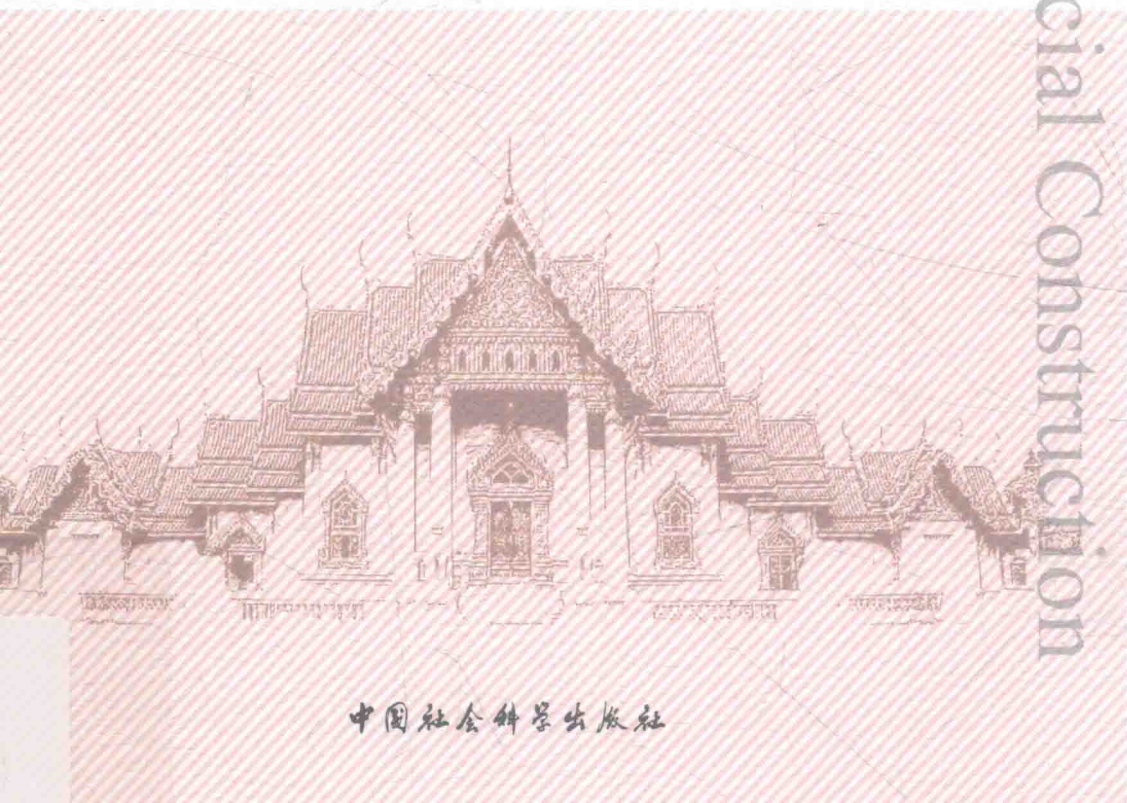


Geo-Culture and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地缘文化及其 社会建构

东南亚宗教、民族的政治社会学视野

周 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eo-Culture and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地缘文化及其 社会建构

东南亚宗教、民族的政治社会学视野

周 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文化及其社会建构: 东南亚宗教、民族的政治社会学视野 / 周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8794 - 4

I. ①地… II. ①周… III. ①地缘政治学—研究—东南亚 IV. ①D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3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优秀成果资助项目成果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创新团队资助成果

云南大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学科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宗教学学科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地缘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传统对国际政治的挑战	(7)
第一节 “希拉里之问”在警示世界什么?	(7)
第二节 “地缘文化”:书本中昭示的那些不可忽视的传统、现在与未来	(8)
第三章 文化与国际政治	(22)
第一节 国际政治理论中文化的缺位	(22)
第二节 温特的建构主义及其“结构理念主义”理论“缺陷”	(27)
第三节 中国的地缘文化研究及其发展	(31)
第四章 “文明的断层线”上的地缘文化	(43)
第一节 东南亚中南半岛:“文明的断层线”?!	(44)
第二节 为什么是两个维度:民族和宗教?	(46)
第三节 视角、框架与历史区间	(48)
第五章 地缘文化基本理论研究	(51)
第一节 对“地缘”和“文化”的讨论	(52)
一 什么是“地缘”?	(52)

二	什么是“文化”?	(53)
三	“地缘”与“文化”间的关联性	(56)
第二节	国际关系学视野下的地缘文化基本理论	
	研究	(58)
一	地缘文化的含义:国际关系学视野下对 “地缘文化”的界定	(59)
二	地缘文化的载体——地缘体	(61)
三	地缘文化的建构机制	(64)
四	地缘文化的属性	(73)
五	地缘文化的特征	(75)
六	地缘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79)
七	地缘文化的分类	(82)
第三节	地缘文化与其他文化概念的关系:对国际关系学 视野下地缘文化内涵的再界定	(85)
一	地缘文化与“文化”	(85)
二	地缘文化与区域文化	(87)
三	地缘文化与文化圈	(87)

第六章 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机制研究

——以民族和宗教对中南半岛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

	为例	(91)
第一节	中南半岛“地缘体”结构解析	(92)
一	中南半岛总体地缘格局	(92)
二	中南半岛“地缘体”结构和关系解析	(93)
第二节	民族与宗教及其对中南半岛地缘文化的 社会建构	(97)
一	民族对中南半岛国家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	(99)
二	宗教对中南半岛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	(143)

第七章 民族与宗教:地缘文化建构中的模糊二元维度	(197)
第八章 地缘文化对国际体系文化的建构 ——从“国家层面”到“超国家层面”	(214)
第九章 地缘文化及其建构机制 ——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建构作用	(230)
第一节 温特及其“结构理念主义”理论缺陷:被忽视的 “地缘文化”及其理论研究意义	(230)
第二节 多层次、多维度的“地缘—观念结构主义”: 二元模糊维度和国际体系“双向互构”理论 ...	(234)
第三节 地缘文化与权力:不可忽视的民族、宗教维度 政治社会基础	(238)
第十章 不应隐没的“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们:来自 行为体内部的社会建构	(248)
参考文献	(258)

第一章 导论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 21 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有两个趋势尤其引人关注：一是全球化过程正在冲击消解着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基于地缘、经济、文化等的边界壁垒，正一定程度地削弱和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政治；二是地缘文化因素对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如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的冲突和竞争前所未有的频繁和激烈，文化越来越从原先附属和服务于政治、经济等的低政治因素，上升为能够影响国际政治的高政治因素。虽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政治性仍然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基本特性，国际社会考虑国家间关系的首要判断标准仍是政治和安全关系，然后是经济关系的考量，然而不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当今时代，正在成为一个“文化时代”^①。在文化时代，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不断加深的同时，将不得不面对文化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区域社会和各国间交往的显性重要因素这一事实，文化的冲突、竞争与交流、融合，将成为阻碍或者促进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秩序的构建和各国、各区域之间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于“文化”这一社会发展重要因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有意识地强调本国、本地区文化，保护文化传统与

^① 傅守祥：《文化时代：全球性博弈与中国战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2 月 24 日 A-04 版。

“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共存，捍卫文化权利和争夺文化利益，成为一种促进发展、提升自身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这成为全球化影响下各国、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有关地缘文化的研究开始进入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

地缘文化是随着作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流派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经济理论的发展而衍生出的学说。不同于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将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加以系统化来指导政治决策的研究方式，地缘文化学较为注重对一个自然地理区间的文化因素对国家政治决策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但与已取得长足发展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相比，地缘文化学的发展还较为慢弱，尚未产生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在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成熟的地缘文化学理论，因此，地缘文化学还未实现在国际政治学界与地缘政治和经济学派的三足鼎立之势。然而，这种局面的逐步形成将是国际政治学在地缘学理论发展方向上的一大发展趋势。

很明显，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文化因素已日益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动因，在“9·11”事件后更是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因此，在政治社会学视域下对地缘文化及其理论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地缘文化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可丰富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视角。深彻地观察和缕析地缘文化这一理念及其背后的宗教、民族、历史传统等社会性建构因素，不仅能帮助我们洞察到其日益浮出水面并显示出的强大隐性权力或半隐性权力之威力，而且对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今世界复杂纷纭的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类问题如宗教冲突、民族主义、种族冲突、难民危机、局部战争、区域和平进程、国家间关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与政治乱象，将有一定助益。基于此，希望本书关于“地缘文化及其社会建构”的研究路径和理论建构，对于丰富上述学科的理论 and 现实问题研究，也是有其价值

和意义的。

本书前半部分将结合地缘文化学的相关成果,在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下,首先探讨地缘文化的含义、一般属性、特殊属性、特点、结构、类别等基本理论问题,并提出其建构机制的一种基本理路,即“地缘文化是由‘地理性建构’和‘社会性建构’双重建构形成”。书中还提出了“‘政治敏感性’和‘可建构性’是地缘文化最根本的特征”等新的理念和观点;然后,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将聚焦中南半岛的民族和宗教两个该区域“显性”的主要社会因素对该区域“地缘文化”的社会构建,以及区域和区域内各国的“地缘文化”特征,并对上述地缘文化问题对当今国际政治秩序和区域地缘政治的影响作一讨论。

后半部分通过对民族和宗教这两个对于中南半岛地缘文化具有重要社会建构作用的维度在该区域“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不同建构方式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二者对中南半岛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机制,认为“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共有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至少划分为三种模式,即“单元模式”、“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并对国际体系的文化模式产生建构性作用。因此,本书提出国际体系文化的“结构性观念主义”建构模式应该是“双向互构的”。这或可进而为理解东南亚、亚洲、其他区域范围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现象提供一种分析路径。

概言之,“地缘文化”及其建构机制尤其是其社会建构(机制)的研究,不但涉及宗教、民族等维度的政治社会学视野,而且应可成为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视域。

本书的逻辑框架建立在政治社会学范式下,即注重社会因素、社会基础对政治的影响,特别选取宗教、民族两个对各国、各区域和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具有重要建构作用的社会因素维度,以东南亚中南半岛区域为例,深入探讨了二者作为该区域的一种“强作用”的显性社会存在,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所具有的政治建构意义。

本书的另一理论出发点，乃是基于对温特建构主义的一种考察和反思。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为 20 世纪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带来了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后新的研究角度和范式。但值得进一步考察和反思的是，温特所提之“结构性观念主义”理论是存在疏漏和缺陷的。即它作为一种结构理论，仅仅关注了从超国家的国际体系结构层面的“共有观念”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建构影响，而忽略了来自作为国际体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以及可以作为国际体系行为体的重要补充的一些单位（本书称为“地缘体”）内部的“共有观念”对国家层面和国际体系层面文化的社会构建。温特所看到的国际体系文化的“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模式建构，仅仅是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观念主义结构体系的分析视角。但笔者认为，国际体系文化的结构不仅应该包含这种单向性的建构，还应该关涉来自国际体系行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性建构内容，应该关涉行为体内部地缘文化社会建构中含有的“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的文化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本身受到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基于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宗教等社会结构的建构，反过来又会对国家（或其他地缘体）层面有着先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共有观念”的先导性建构作用。因此，本书提出：国际体系文化的“结构性观念主义”建构模式应该是“双向互构的”。

地缘文化及其社会建构研究将成为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新视域，它将启示我们“基层”不应被“上层”和“顶层”所遮蔽和隐没——国家和区域内部社会所存在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因子，仿佛高高在上的三个文化巨人的分身或影子，那种在行为体内部社会广泛存在的“文化影子”，如影随形，是不应被身处“高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另一个自己所隐没和掩盖的。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双向互构”理论架构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假设，即如果当今世界的主权国家或大多数地缘体单

位多秉持“康德式”或“洛克式”的价值观念，主动且努力建构此两种类型的地缘文化的话，那么这个现实世界从理论上来说就可以日益避免一种“霍布斯式”的冲突与紧张。虽然这个假设，这个貌似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实现的“天下大同”之理想主义愿景，在当今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在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的那些土地上，在以某些“唯恐天下不乱”进而不愿放弃以各种混沌战略肆意干预地区局势以保障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利益的国家的价值观念中，在那些因为战乱、经济危机或是民族冲突而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的政治难民、经济难民和社会难民无奈、无助甚至无望的眼中，显得如此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在研究路径、视域和立场选择上，笔者是在尽量做到一位社会学者所应持有的价值中立原则的基础上，试图以一种结合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尽管笔者本身的学术视野和成长经历中有过这些专业背景和学术训练但又学艺不精）的方式，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下来进行的。诚如北京大学张静教授所言，政治社会学的“主流分析立场是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及定性研究式的，这不同于实证社会学的客观性制约、独立变量的假定”^①。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Orum）认为，“文化”是政治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重要概念。他在《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中，将“文化”与另外三个对象即“权力”、“制度”和“网络”一起，作为其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路径^②。他在书中亦指出：“文化，作为用来理解社会动力的方法，已日益成为当代社会学家的工具。……通过追踪某一社会的文化特质来更好地理解其政治维度。这其中一种常见的方式，乃是考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民族习惯的表现形式。民族习惯代表了一种文化

① 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世华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5页。

形态，它有别于以疆域为界的国家组织。”^① 本书在研究东南亚中南半岛各国的宗教与民族两个维度时的相关论析，即是循着这一政治社会学路径。但该部分内容中对“跨国民族”和“外来民族”，以及“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等部分的讨论，又不完全囿于其所言之以“在大部分人群中存在的某种信念”之“文化”定义^②，而使得书中的一些思考获得了在更广泛层面上的一种政治社会学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可能成为一种探索国际政治社会学对于文化与权力、权力与社会、社会与政治、政治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路径。

这里，笔者想借用凯特·纳什（Kate Nash）和阿兰·斯科特（Alan Scott）在《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一书引言中的一段话，来为本书中的研究路径和分析角度之选择作一“自圆其说”：

政治社会学，正是由于其处在政治、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传统间隙中能够，并且一直以来都能够站在绝佳的位置上吸收并传播刚刚出现的发展成果，以及理解这些——很可能是武断的——边界的模糊之处，还可以认识到这些“领域”之间联系的密切性。假定这种解释更为有利，或者更为方便，我们试图使本书包括较新的论争。同时试图超越“政治”领域，涵盖到“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因为这些领域触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问题。^③

①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世华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页。

② 参见[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世华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页。

③ [英] 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李雪、吴玉鑫、赵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第二章 地缘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传统对国际政治的挑战

第一节 “希拉里之问”在警示世界什么？

“一部电影引发的悲剧”，这是许多媒体报道 2012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遇袭身亡事件中发出的共同感慨！在震惊全球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的 11 年后，又是在“9·11”这一天，又是一幕针对美国的惨剧的发生，再次点燃了世人对“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和民族等敏感文化问题的关注。

事件的起因是一部由一位美国籍导演制作的名为《穆斯林的无知》的影片。“在利比亚等国引起广大穆斯林极大愤怒的正是挂在 YouTube 网站上的这部电影长约 13 分钟的‘片花’。其中充斥着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内容，甚至将穆罕默德描绘成‘好色嗜杀的骗子’和‘有恋童癖的私生子’。”^① 为了表达不满情绪，一大批利比亚激进的萨拉菲派穆斯林聚集在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门前进行抗议。之后，便发生了美国大使和一名领事死亡的惨案。据报道，美国大使的尸体还被抗议人群拖着示众，惨不忍睹的照片也在网络上疯狂流传。

这部电影引发的悲剧远不止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的牺牲。在埃及，在也门，人们冲击美国使馆，放火焚烧使馆公共设施和美国国

^① 湘溪：《一部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国际政治》2012 年第 12 期。

旗。“在黎巴嫩、伊朗、叙利亚、突尼斯、苏丹和巴基斯坦、印控克什米尔等地，甚至在欧洲的法国也相继爆发了反美示威……”^①

正式宣布参加 2015 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美驻利比亚大使遇袭死亡后曾感言：“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拯救的城市会发生这样的事情？”^② 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称为“希拉里之问”。

这一令全球震惊、被称为“班加西之痛”的事件，既是一起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事件，从某些方面来看，又几乎是一起纯粹的因为宗教信仰被践踏而引发的民族情绪的宣泄所造成的文化事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文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什么因素让美国政治精英也为之困扰，不明白为何自己“帮贫扶困”的“善意”会遭到如此的打击。其中的原因或许千头万绪，但宗教和民族等文化因素的存在是确凿的，而且在美国人和利比亚穆斯林之间的主观意识和思维方式有着许多不对接之处，更是关键原因。

由此便引出了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关注到由不同的民族、宗教信仰等因素构建的不同地缘文化，会给不同的行为体带来相异的意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们的存在，使得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不再仅仅囿于新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而更多地与建构主义的有关社会的、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有关。

那么，什么是地缘文化？它又是如何被建构的呢？

第二节 “地缘文化”：书本中昭示的那些不可忽视的传统、现在与未来

西方与地缘文化相关的研究大都从地缘学和地缘政治学中衍生

① 湘溪：《一部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国际政治》2012 年第 12 期。

② 同上。

出来。源头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地缘学说”。但如果涉及西方国家对地缘学说中文化因素的非系统性考察研究，则渊源更加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第（Hipp Crates）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地方》中就曾明确提出过地理气候对人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则认为海洋环境会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商人的气质；之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地理纳入历史和文化的考察范围，创立了环境地理学。

到中世纪时，“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地缘学说”的雏形得到进一步发展：16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J. Bodin）提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进步。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法国学者孟德斯鸠也曾在其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和民族精神有着“系于气候的本性”、受“土地的本性”的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到19世纪时，“地理决定论”已经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学派。当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的F. 拉采尔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和空间位置，是造成人们的体制和心理差异、意识和文化差别的直接原因。现在看来，虽然过于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对社会和民族所具有的作用，并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地理决定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神学垄断学术、强力压制科学探索的时期，仍对当时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归起到过显著的推动作用。19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G. W. Hegel）在其《历史哲学》中，相对客观地评价了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所提供的有限的可能性和作用力，但他同时强调除了地理因素，还要重视对人文因素的分析。他说：“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

^①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孙立坚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68页。

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①可见，他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地理决定论，深刻认识到文化是在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马克思对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社会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则又较之黑格尔的研究有所发展。瞿林东先生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做了总结：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②。

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在《英国文明史》中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社会的不平等也是合乎自然的。他和欧文（Owen）都认为，气候、土地和食物是文化是否发达的三大决定性因素。19世纪末，勃兰德斯（G. M. Cohen Brandes）等文化历史学派也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大因素”^③。

到20世纪，地缘文化学说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并部分地被运用于国际关系分析中。1917年瑞典政治地理学家R. 谢伦（R. Shellen），受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及其在1882年《人类地理学》中地缘文化学说的启发和影响，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一词。他在书中讨论了人类分布的原因，探讨了各种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的影响。他提出地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第74页。

②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130页。

③ 参见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